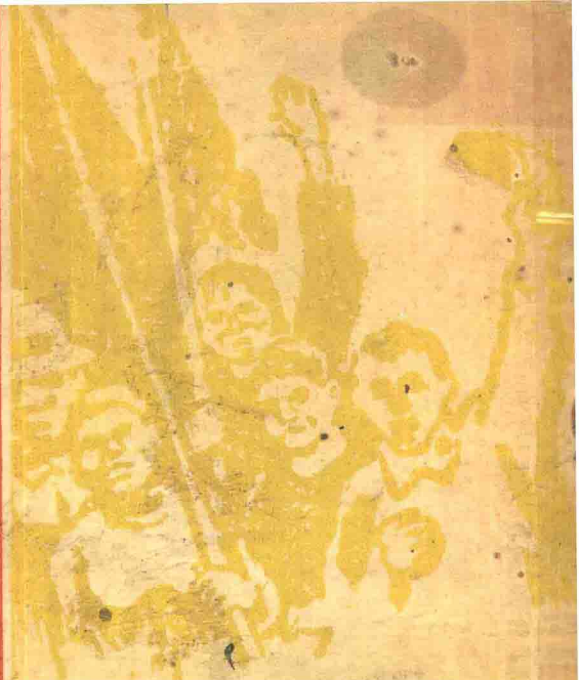


# 民主人士群像



新中國現勢叢書  
司徒健編  
聯合編譯社發行







新中國現勢叢書

民主人士羣像

聯合編譯社發行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一第日十月六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編輯者 司徒健

發行人 蔡力行

發行者 聯合編譯社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二一七室  
南京太平路揚公井六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售册每

元

# 目錄

堅持三大政策的孫夫人	(一)
中國華萊士——李濟深	(四)
民主老將張瀾	(六)
人民救國會領袖沈鈞儒	(八)
革命青年領導者郭沫若	(一三)
獨裁者的勁敵羅隆基	(一六)
職教社的創辦人黃炎培	(一九)
農工民主黨領袖章伯鈞	(二一)
民主促進會領導人馬敘倫	(二三)
愛國僑領陳嘉庚	(二五)
威武不能屈的張東蓀	(三一)
人民政治家鄧初民	(三四)
在南洋苦鬥的胡愈之	(三六)
勞工領袖朱學範	(三九)
婦女解放的先鋒劉清揚	(四一)
繼承魯迅遺志的許廣平	(四四)

## 堅持三大政策的孫夫人



孫夫人是宋氏三姊妹中間的二姊，被美國記者賽利文稱之為「中國人民的錢袋」的孔祥熙夫人宋謁齡，是她的大姊，而「中國第一夫人」的宋美齡則是她的三妹，雖然她和她的二姊妹出自一系，但她與她們竟有着天淵的分別，尤其是在政治信仰上，她的二姊妹和蔣介石，組成了四大家族——封建買辦的最高集團。但她則相信中國人民的力量，她對人民的尊敬與鼓勵是持久而真實的。

自從一九一五年（民四年）與總理孫中山先生結婚以後，她便和總理一同為着民主主義而工作。五卅慘案發生，總理已經逝世，孫夫人由北京到上海，積極地參加了反帝國主義的偉大的運動。民國十四年冬，國民黨一部份中委鄒魯，謝持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廣州的革命政府，孫夫人會通電指斥他們離叛革命，有「總理泉下有知，亦當痛哭」的話。次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孫夫人當選了中央執行委員。是年二月九日，粵師北伐，很快就攻下了武漢，中央決議遷都，十月間孫夫人與孫科、宋子文、鮑羅廷等被派往北京，在武漢召開中央聯席會議，對將等逗留南昌觀望不前的態度大加指斥。十六年三月十日，又舉行第三次中全會，改選了常委及中央各部部长，孫夫人擔任了婦女部長，通過統一黨的領導（即「提高黨權」案），統一革命的力量。但是蔣介石到南京後便首先舉起了「清共」之旗，長沙馬日事變發生，七月十五日武漢動搖分子也開始反共清黨。孫夫人為了對推翻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叛徒，公開地表示抗議，她於是年秋離開中國，訪問莫斯科，她留在蘇聯及歐洲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民十八年）的五月六日，因孫總理的紀念會而回到中國，在她留歐期間，曾參加了「世界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和「國際革命

五濟會」。也在這時候她表示了對她妹妹的婚姻不滿，她的整頓家庭也很快聯合蔣介石來反對她。

她住在上海直到日寇佔領上海為止，當每一個主要的政治危機出現時，她總是不斷地向當局抗議，民國廿一年底她與蔡元培、楊杏佛等發起了「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她想通過這同盟而獲得審判權，並為五萬政治犯進行監獄的改革，但當該盟秘書楊杏佛被暗殺之後，這組織就無形中停頓了。

日本侵略滿洲後數年，孫夫人做著鼓勵抵抗日本進軍並阻止內戰延續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廿一年）她在上海交通大學設立了一所醫院，一九三七年（廿六年）她主持「保衛中國大同盟」，並遷到香港。從事陸軍醫藥工作，盡心地幫助一切抗戰份子，八路軍和新四軍也沒有例外。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完成對邊區的大封鎖。孫夫人於是四處奔走，呼籲解除封鎖，以便把藥物接應品送給邊區人民。她痛斥封鎖的行動，影響抗日受傷戰士的救治，是一種不可寬恕的罪行。這一簡單的呼籲，便擴大了「保衛中國大同盟」活動。一九四一年（卅年）有名的「皖南事件」發生之後，孫夫人發起了「人權運動」，反對當軸破壞抗日統一戰線。

是年十二月，日軍攻打香港，孫夫人坐了最後一架飛機離港，飛到重慶。一到重慶，國民黨政府便不許他離開重慶，到別處旅行，亦不許他發表任何公開聲明，所以她只能在「週年紀念」之類的機會，政府請她寫文章時，才執筆起來。在這些被要求而寫的文章中，她依然強調孫中山的基本政策。這種神是非常難得的。

自從一九一五年以來，孫夫人一貫地堅持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堅持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植農工。她堅決的信任人民的力量，雖然各式各樣的角色，都嘗試利用孫夫人，但她沒有失去理智。（尚平）

## 中國華萊士李濟深



李濟深字任潮，廣西梧州人，生於一八八六年，今年六十三歲。李濟深是國民黨前輩，北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員大將。社會上所稱桂系，如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夏威、黃旭初等，不論或文或武，都是他的晚輩。

當福建組織人民政府時，李濟深便是一位實際的指導者。但不幸失敗了。

抗戰後，李濟深在重慶，他的職務，是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二十九年，桂林行營撤銷，改為辦公廳，他被任為辦公廳主任。這個辦公廳主任，是毫無實權的閒職，這個機關只是用來轉遞公文的，他擔任了這麼一個閒職，人家還是不放心，還派了辦公廳副主任去監視他。他也樂得鑒賞書畫，不問政治了。

正當這個時候，東南文化人士往內地走的，因為桂林當軸對於文化人士最為尊重，而且言論出版相當自由，因此很多的人都住了下來，迨日敵掀起太平洋戰爭，香港的文化人士也都往桂林跑。當然這些文化人士，對於重慶的作爲是不滿意的，於是便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意見了，當時在重慶的政府當軸，大爲震怒，命令桂省當局把這些文化人士「移民」到重慶去，以便一手鎮壓，但是，結果，是沒有下文。這，正是李濟深與桂省諸主持人開明的成就。

重慶便調李濟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一個更崇高而必須到重慶去的閒職，他當然不去了。他便在桂林城外住下來，做老百姓了。

三十三年，日敵犯西南，進桂省、佔桂林、逼貴陽，李濟深便到故鄉梧州，組織遊擊隊以抗日敵。



他目下在江西兩廣的軍事組織，便是以這時候的遊擊隊份子爲基礎的。

勝利後，李濟深到南京到上海，但到處爲把持政權者所排擠。他很清苦，他把南京的房子頂掉，在上海過了一些時候。

當政協決議被魔手推翻的時候，李濟深與民主人士聯名致書僞府，請緩開所謂「國大」，以免政協垮台，但未爲僞府採納。僞府與高彩烈的開演「國大」的一幕，於是周恩來北飛，談判完全破裂，便一直「戡亂」，「戡」到今天。

於是，李濟深南去香港，團結國民黨中進步人士，建樹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由李濟深任主席，柳亞子、何香凝等都是革命委員會委員。

李濟深在香港，經常的發表斥責僞府的文章，同時，與在香港的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聯合起來，與中共約判華北去舉行新政治協商會議，商討民主的原則及聯合政府的政綱。

當李濟深與其他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陸續到了華北，他們集中在石家莊，舉行新政協，他們五十五個人發表了宣言，載釘斬鐵的聲明中共所提和談八項條件必須做到。

同時，李濟深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發表了「告同胞書」，這是革命委員會單獨發表的。

「告同胞書」的開頭，敘述國民黨的簡史。他說孫總理手創的「真正的三民主義，是要人人能平等，能說話，人人有工作，有飯吃，達到「民治，民有，民享」的目標」，現在，「倒被他一手造成「民弱，民窮，民死」的「三民主義」了」。

其次，說到南京的徵兵，徵糧。「同胞們，應該記得勝利的那一年，國民政府說免了我們的錢糧，誰知他明免暗加。他們的縣長，向我們借錢，一借就是平常的四五倍，逼得我們連吃米都繳光了。這是「免人民錢糧」嗎？爲了打內戰，從大前年抽丁起，一年抽幾次，我們心愛的丈夫、兄弟、兒姪都派出去當兵送死，這已經够傷心的了，但他們還要我們出錢，他們又賣壯了，有錢得生，無錢該死，抓了就

賣，賣了再抓，這個日子是人過的嗎？」

他一方面敘述人民的窮困與顛連，另一方面敘述官僚的荒淫與無恥。「我們快要餓死了，而他們這般狐羆狗黨，一天到晚滿嘴油膩膩的，全身光晃晃的，專在我們小百姓頭上打主意。他們陞官發財，住洋房，買金條，置田產，左擁右抱的小老婆……他們在我農工同胞頭上刮錢還不够，又統外匯，自己買來大批洋貨設立公司，把我們小資產階級的錢，一起刮在腰包裏……」

「爲了剿「民」，不惜賣基地和內河航行權。要向美國借錢，派他老婆去哭訴，帶走了八十箱美鈔，這是人民的血汗錢。包得起飛機的老爺們，都到香港台灣逃難去了。吃不飽穿不暖的文武公教人員受活罪，留下拋妻別母的士兵們充砲灰。」

他對於和談，有一個分析，有一個辦法。他認爲僞府的「和平聲明，全是與英美帝國主義勾結起來的一種陰謀……很想得到一個停戰談和的時間，好重整軍隊，再來掙扎他這垂危的命運」。

「我們和中共及友黨一致決定，除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和少數爲首的草菅人命發動戰禍的人之外，其餘是一律寬大爲懷的。只要你們反帝反封建，文官怠職，武官反正，工商界響應，不但不清算不鬥爭，而且一律受到保護，引爲新進同志。」

這「告同胞書」，可以說是李濟深及整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最近政見。（慧先）

## 民主老將張瀾



這是一個真正當得起「正氣磅礴」四字而無愧的人，一個樸實蕙直得令人生長而又可愛的人。

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記憶力強的人都知道是民盟首先提出而獲得人民領袖毛澤東先生的贊同的，這種政治理論在張瀾先生是早已躬親實踐過了。民國七年他任四川省長時，他的祕書長是潘大道，一個國民黨員，這事惹起他的進步黨同志們不滿，他曉諭他們道：「四川人才，屈指可數，如因黨籍而排斥他，政治上不得人才，於老百姓何益？政黨不是私人權利集團，乃是爲了政治。」民國十八年他長成都大學時，所聘教授有青年黨的李璜陳啓天魏時珍等，國民黨的熊曉岩等，有保存國粹的任山腹，打倒孔家店的吳虞，還有共產黨人。當時大有「租界」之稱，一切被認爲「思想有問題」的學生教授，都以該校爲避難所。

他有兩個兒子，大的留德，攻自然科學，老二留俄，攻社會科學。他出身寒微，所以始終保存節儉的習慣，唯其儉，故雖從官多年，仍極清廉。他的父親是佃農，妻子是農婦，一直到他做省長時，他父親妻人仍在故鄉種田，并未因之昇爲「老太爺」和「省長太太」。他刻下的生活，全賴他作大學校長時，其夫人代爲積蓄了二千七百塊大洋，於民國二十年南充原籍置了點田產，現在每年可收七十多石的租穀。

關於他的思想，仇者每誣爲共產主義者，其實他所授的教育仍以儒家影響最深。我們可以這樣說：他的公私生活是取儒墨兩家思想的精華而形成的。在個人方面的勤儉刻苦，是墨者；在政治方面的思想

出發點，是孔孟之道。他曾寫過一本書，名「說仁說義」。又常說：「中共的說服運動，坦白運動，是以孟子性善說爲出發點的。」他近來寫過一本小冊子，名爲「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他對民主的「民族形式」的定義是：「尊重他的長處，不迴護自己的短處，隨時隨事自省，這即是民主。」他對盟內同志說：「一個政治團體寧可百年不上政治舞台，而不可一日失掉了自己的立場。」這不是充分的表徵了儒家的「言忠信，行篤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優良傳統嗎？可惜那些口口聲聲喊「恢復民族固有道德」的人不實行，別人實行了，却視之爲眼中釘。

說到這裏，還有一件事隨得大書一筆，現在還有一些人在談說着第三方面散夥的前後故事，從而也就有人論及第三方面的立場和態度問題。世人都熟知第三方面是中立的立場，態度是中間性的。然而在國民黨反動派破壞了國內和平發動內戰前後，第三方面發生了新陳代謝的現象，便使人滋長了懷疑，中間性或者中立態度應有一個如何的解釋呢？記得卅五年夏間成都華西晚報及重慶民主報上都登載過一篇張瀾的文章，論述民盟的態度，爲中立二字下了個解釋。他說民盟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組織，是在國共兩黨以外的政治團體，在若干基本問題上却並非站在「中間」來作調和的。爲了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就根本說不上「中間」二個字。有利民主的實施，是的即贊成；破壞民主的措施，否的即反對。民盟組織是獨立的，主張有時或於甲相同，那是因爲甲有利於民主；有時或與乙相反，那是因爲乙不利於民主。瞭解張瀾的思想及其政治態度，這是不可忽視的一點。

最後我要講一個小故事：當民國起義時，他領導保路同志會爲反封建而鬥爭，曾被當時川督趙鳳翼逮捕，受審時手被反縛，頸上交置馬刀，胸口對着洋槍，但他面不改色，侃侃而談，趙被說得面紅耳赤，莫可奈何，終審時只是感嘆道：「張瀾，太橫強了！」是的，他就是這樣一個爲真理而「橫強」到底的人，正義之所在，從不會爲威武所屈，過去的張瀾是這樣，卅八年後的張瀾，仍舊是這樣！（辛斤）

## 人民救國會領袖沈鈞儒



假使你健忘，一定會記得十年前上海全國抗日救國會，爲了鼓吹抗日救國，七君子被捕入獄的事情。沈鈞儒先生就是七君子之一。在國內，一般人都稱他「沈老」，或者沈老先生。他的同年輩像黃炎培先生和張瀾先生等，則又稱他爲「衡老」，因爲他別號衡山，所以他們這樣稱呼他。救國會系統的人呢，對他又另有一個別緻的稱呼：「家長」。

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筆者剛從日本讀完書回來，回到母校——浙江女子師範——任教。行開學典禮那天，正是陰歷七月底，天氣非常炎熱。我坐在教員席裏，右面是人頭擠擠的五六百學生，裏面有些還是過去的同學，對面則是長官及來賓席，人並不多，其中坐一位有三絡鬚鬚的老先生，他穿了一件半新舊的白紡綢長衫，手裏拿着一把長摺扇，眼觀鼻鼻觀心地坐着，望去有些道貌岸然。這時一個不安的記憶浮上了心頭。記起了五六年前自己還是在這學校裏做學生的時候，學校裏每星期總有一次名人演講或者官長訓話的。碰到講題不合胃口或者演講者口才不好的時候，我總是大胆地坐着打瞌睡。根據經驗，料定這位老長官講的一定很陳腐，冗長聽不入耳的。做學生時代偷個懶瞌睡一下，至多遭訓育主任的一頓訓斥就完了，今天可不成了，怎麼辦呢。正在不安時，司儀叫着長官訓話。在這老長官上台以後，校董來了一個介紹：「這位是浙江省政府委員沈鈞儒先生。沈委員是前清進士出身，後來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現在希望大家靜聽這位黨國先進的訓話……。」

出乎我意料之外，這位老先生的聲浪雖然並不怎樣宏亮，但是說的話，不但不是我猜想的那樣陳腐

，而是很新的，他的結論是今天的女子教育，應該是女子解放的教育。博得了全堂雷似的掌聲。他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這位先生人雖老，而他的頭腦却不老。

由於中國大革命浪潮的一時低下，接着是國民黨清黨，各地省政府改組，從此多年沒有遇到這位先生，連他的名字也很少聽到，原來是由於省政府改組，他獨自到上海做律師去了。他同時還在上海辦了一個法政學校，造就律師人材，想借此來保障人權。

八九年以後——民國二十五年前後。那時反動政府，正還彈着「攘外必先安內」的老調，可是真正愛國的人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救亡運動在許多角落裏掀動着。在一次文化界救國會的發起人會上，我又重新遇見了這位老先生。比初次見他的時候更蒼老了，頭髮鬍鬚花白了。但是他的思想却反更前進着，他和青年人同樣主張要立即抗日，要抗日必需團結全國力量，要團結全國力量，必須立刻停止內戰，停止反共。

由文化界、婦女界、職業界各救國會組成了上海各界救國會，再由上海各界救國會而組成了全國救國會。抗日救國運動瀰漫到了全中國，聲勢浩大！於是救國獲罪，七君子在上海被捕了。

上海是租界，反動政府要捕人民，都得通過租界的巡捕房。（巡捕就是警察，巡捕房即警察局。）當巡捕們到沈老先生的家裏去捉人的時候，沈老先生笑着迎接着他們，因為早已預料到一定會有這一天的。一個中國巡捕摸摸手銬預備將沈老先生的雙手加銬時，他對沈老先生仔細一看，自言自語說：「我看你老先生是個好人，怎麼政府會說你是反動份子呢？」他將手銬藏回了衣袋，讓沈老先生走在前面。

入獄後開始審判了。法官說：「現在只有共產黨才在叫抗日，你也叫抗日，所以你一定就是共產黨。」沈老回得極妙：「共產黨是吃飯的，所以吃飯人都是共產黨嗎？」弄得法官沒有話好回答他。

七七抗戰軍興，七君子也隨着國共團結抗日而被釋放了。等到偽軍委會移駐漢口，國共兩黨切實合作，偽政府爲了表示接受民意成立國民參政會。這時救國會已被公認爲一個政派，沈老先生和鄒韜奮陶

行知王浩時史良等救國會負責人物被指定爲國民參政員。在這期間，國民黨內部漢奸份子，開始做起破壞國共團結的磨擦工作來了。沈老先生等雖然沒有人再公開地說他們共產黨，但是暗底裏都把他們當作異黨看待。而沈老却不管，對救國會內部或對外，常是這樣主張：國民黨居右，共產黨居左，我們救國會則是居中。現在左右又在分裂又在磨擦的時候，我們可以起調和作用。性急一些的青年幹部對他說：「現在不向右就得向左，居中是不可能的。」但他堅決地說這可能性不但絕對存在，而且將來這中間勢力將會發揮更大效力。他比喻着：右派是落後的，左派是前進的，居中正是不很前進也不很落後，而國人的大多數還都是這樣的人。

民國三十年初，國民黨中的頑固份子，一邊積極反共，製造磨擦，一邊壓制民衆，不願動員民衆抗日，許多在野的小黨派在這個獨裁的壓迫下，團結起來了，國家社會黨，青年黨，鄉村教育派，職業教育派，第三黨這些政派聯合起來，組織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當時救國會派，雖然被邀參予會商談話，却沒有加入組織，這是因爲在以上五個政派看來，救國會比較左傾。其實民主政團同盟的主張正是沈老先生幾年來的主張。

三十三年十月，由於民主政團派羣衆不多，力量不大，於是擁有廣大羣衆和廣大文化幹部的救國會派被邀加入同盟了，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也就在那時改爲中國民主同盟。沈鈞儒先生也就被推選爲同盟的中央常委。從此同盟成爲中國國共兩黨以外的一大政治集團，在抗戰時期，力主團結抗日；抗戰勝利以後力主和平建國，反對內戰。在國共兩黨之間，起調和作用，在廣大羣衆間，起着團結中層階級的作用。從此沈老先生過去的政治主張，得以真正地實現。

沈老先生的私生活，是勤儉兩字。他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兒子都已經成家立業了，他尊重他們的自由獨立權利，讓他們在外面獨立成立小家庭，不要他們來奉侍他，而他自己只帶了小女兒在重慶棗子嵐埡的一個山坡裏租屋居住。他的女兒還在學校讀書，所以實際上就只他一人住在那兒。伙食是包給

同住的朋友家裏的。叢子嵐埏是相當高的山坡，要去重慶市區，得上下三百多個石級，年輕人都不免要坐轎子，沈老先生却從不坐轎子，不管晴天落雨，總是徒步往返，朋友告訴他說：「沈老你年紀大了，下雨坐坐轎子吧，這條路太難走了。」他的回答是：「走慣了，一點也不費力，而且借此可以舒展筋骨，對身體有益的。」重慶每年從十月初到次年三月底，不是濃霧迷漫，就是陰雨連綿，道路泥濘。人們常會看見一個壽星頭的老先生，一手撐着油紙雨傘，一手捺起長衫角，健步在大路上，或者輕步在石級上，他的舉步比青年人還要輕鬆。一碟花生米，半個鹹蛋，是他經常的簡食。身邊事，從不要借手他人。五年前他的小女兒也結婚了，從此他就一個人獨居着，奔忙着，苦鬥着。

沈老先生自奉雖然非常儉樸，但對人却很慷慨。窮朋友向他借貸，總是有求必應，只要他身邊有錢，五元十元甚至上百，毫不吝嗇，所以他的衣袋裏的錢，很難得留宿過夜的。朋友們勸他：「你年紀大了，得多吃點滋養食物。」他搖頭說：「我自自健身術，不必吃滋補品。」他對一般人是這樣，對於他的幹部，真好像一個慈母對愛子。不管他們或她們的個人事業，家庭細故，甚至婚姻離合，都勞他老人家的十二分關心。假使幹部中有人生病了，他總得親自去看他，還得代為忙請醫生問長問短。記得他五年前，過不慣重慶的政治氣候的濃霧低氣壓而病了，有一天，這位家長特地跑來，嚴正地說：「你得當心，我着你的病，醫藥是沒有用的，我有一套健身術，這是我數十年來身體健康的唯一良藥。」他說過以後，就將他每早必操的健身術教給我。我說：「我想離開重慶到外地去走走，也許會好起來。」他說：「那也好，去去再回來，旅行中你可以試試我的健身術。」半年後我在香港，病好了，朋友們催着我回去，我也正打算回去，劉尊棋先生從重慶飛香港，準備來南洋，遇見了我，劈頭就說：「我上飛機的時候，沈老特地要我關照你，要你千萬不要再回重慶，留在重慶的人，都要出來了。」他對每個幹部都是那樣無微不至，所以鄒韜奮先生提議叫他家長，大家異口同聲都這樣叫他了。

重慶的特務是可怕的，雖然由於沈老先生的德高望重，特務不好公然陷害他，可是他們總想暗算他



。有一次他老先生應中大學生的邀請，作政治演講，正講得起勁的時候，拳頭大的一塊石頭，從屋頂上掉下來，幾乎打中他的壽星頭，只差了七八寸遠。但是他依舊鎮定地講下去，他不怕死，死，在他已視為度外。活一天，和惡勢力鬥爭一天，這是他的生活哲學。（沈茲九）

## 革命青年領導者郭沫若



歸國志感（用魯迅韻）

郭沫若

又當投筆譜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多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上面的律詩一首，是今日文壇重鎮郭沫若先生在一九三七年，改裝離開日本，在日本皇后號上的口占。古人說：「詩言志」，這首詩也就寫出沫若先生一生抱負，和他的四十年來的出處息息相關的。

在北伐軍直搗武漢之後，人們都憧憬着光明的前途，忽然中途被生，甯漢分裂的一幕，反動者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沫若先生知道已經「事不可為」，反動派還緊緊的壓迫，他是不得不走了，他當時並不愛惜自己的羽毛，也是留着自已，以為將來再起的本錢的，何況他在文壇上已經是革命青年的領導者了。

沫若先生在革命失敗後，環顧中國，已全是反動者的勢力了，中國已無存身之處，更沒有他可以憑藉再起力量的了，於是就逃亡日本，這時他暫住在東京的郊外市川地方，那是他的日本夫人安娜的外家，為他租賃的一間屋子，這時的沫若先生是「身無半銅板」（先生詩句）的逃亡者，生活一切全仗安娜女士在醫院裏當護士來維持的，沫若先生就在家照顧着三個孩子，因為國內有了通緝令，他的小說詩歌等國內是沒有人敢收受的了。這時的沫若先生確是相當苦悶，並且聞得發慌，在偶然的機會中，他對於中國的古代社會發生了興趣，因為他見到了殷代的甲骨文和兩周的青銅器，這在過去即使看見了，也不會注意的東西，在那樣寂寞甯靜的無聊日子裏，中國古代社會的探討，將是他運用浩瀚無涯岸，銳利無

比擬的想像力最好的對象」。何況，一部廿四史，盡是帝王家譜，這不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缺陷，也可以說是革命者對於瞭解自己的阻礙。他在極惡劣的環境裏找住這點，以革命者的毅力，發大願心，要把中國一部歷史兜底翻一個身，把他弄明白來，於是十年心血，百萬文字，到今天終於在沫若先生的爬疏下，中國的先秦史是完全可以知道了。他自己曾經說過：

「一部兩周金文辭大系，可列入十三經，並稱十四經。」

這決不是他誇口的話，據我看，有了「兩周金文辭大系」，書經已可廢而不讀了，可是年青的人們！你們得知道沫若先生這些成績，不是僥倖來的，他個人的精力與思想及勤勞姑且不談，他沒有錢買書，他得到處去借書鈔書，沒有材料，他得設法看到甲骨和青銅器的實物。書成了，因有古字的關係不能排印，他得自己伏案手鈔。鈔成了又以冷門的關係，只有給出版家無償的出版。這些也就算了。最難堪的就是日本方面發現他是革命者後，就把他當作一個逃亡的政治犯看待，巡警，刑士，憲兵，不斷的到他家去麻煩，你想一個已是澄靜寂寞的學人受到這種無端的騷擾，沫若先生確是感到相當的不安和煩燥，然而他並不因這種不如意的意外而中斷他的研究。他對付這批不識相的傢伙，沒有別的方法，只有背着手，蹣跚幽閒的步子，朗誦他最喜愛的莊子秋水篇來。沫若先生這時好像升華了似的，聲音是愈誦愈高，神態是那樣的沉醉，好像溶身在南華經裏，與莊周晤對一樣了。精神與文字會合爲一，可說沫若先生在這時是最愉快的了，他那裏意識到眼前還有這些討厭的傢伙，結果叫這輩鼠類抱頭鼠去而已。

沫若先生貢獻了他無比的在中國文化史作爲一個劃時代的業績，他的心血真是嘔盡了，這十年流亡生活，我們真無法去形容，去謳歌，只有一句話，他的艱巨刻苦的精神使「懦夫有立志」。

蘆溝橋事變的炮聲響了，這是十年來反動者惹出來的窮禍，全民族凡屬血氣之倫都憤怒了，猶其已隱伏了十年的真正的革命者沫若先生，他怒吼了，這時國內各方面都感覺到有聯合全民組成統一戰綫來抵抗日寇的必要，於是在各方面的敦促，郁達夫先生的勸駕，朋友學生的佈置下，他終於化裝逃出了日

本。在輪船啓行後的第三日，他纔覺得已經真正脫離了虎口而感覺到喜悅；不覺脫口成詠的賦了這首詩，他不惜「別婦拋雛」底回到祖國來，他將看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奮起抗敵。真的，他們學生會親眼看見他，船到吳淞口時看見長堤上的楊柳，他是那樣的喜悅的下淚呀。這時他的心情已不再是十年埋首作學術研究的心情，而重有了詩人的氣質，革命者的精神，在抗戰的十年，領導着全國青年作堅強無比的筆陣工作。

沫若先生，他將永遠是我們中國革命青年的領導者，尤其在今後，在達到他自己理想的革命的社會時。（疾雨）

## 獨裁者的勁敵羅隆基



羅隆基氏現在五十二歲，原籍爲江西安福縣，父親是一位塞儒舉人，家學淵源，幼年在鄉已打好國學基礎。七歲喪母，十三歲時應試清華學堂在贛省童年班招考，贛省共取七名，他被錄取爲第一名，離家至北平清華學堂作公費肄業，故從幼即養成獨立奮鬥的精神。在校從一年級讀起，共歷九年後畢業。在校時即任學生會領袖，並曾代表該校參加五四運動。官費留學美國時，入哥倫比亞大學攻政治，二年後轉赴英國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拉斯基等教授指導下，繼續研究政治學四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爲「英國國會選舉」。

返國後受上海中國公學聘爲政治系主任，并兼光華大學政治系主任，除在兩校教憲法外，課餘與胡適、徐志摩、潘光旦、聞一多等人辦「新月」雜誌，常發表政論文章。時北伐已成功，南京國民政府正勵行以黨治國，遂因「論人權」一文獲罪當局，於授課時被捕，一日後由蔡元培先生救出。隨後繼續在滬執教，繼續辦「新月」。當時「剿赤戰爭」發生，著文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用武力解決黨爭，主張用政治方式，因之被僞教育部解除其教授職位，並驅逐出滬。

在廿年後的今天提起這段往事，讀者應注意：羅隆基是國民黨反動派執政以來，第一個因思想言論而被捕而被逐的大學教授！是首先爲提倡人權保障而受迫害的教授！是最早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人民內戰而呼籲的人！

他在上海的事件發生後，天津益世報的主持人雷鳴遠神父極爲同情他，也甚欽佩他的思想學問，聘他任該報總主筆。他初到報館時，報紙銷數僅幾千份，他寫社論後，銷數日增，最後多至數萬份，超過

當時津版大公報。他一年要寫三百六十篇社論，另在南開大學任教授。這時「剿共」戰事愈烈，他竭力批評偽政府的錯誤政策，南京多次警告益世報發行人，命令將他開革，否則封閉報館，但雷鳴遠當時頗具背起十字架的宗教家精神，寧可報館被封，不肯改變言論態度，或更換主筆，因為外交關係及南京統治力對華北鞭長莫及，故仍能堅持下去，後來國民黨反動派竟不惜用卑鄙惡劣的暗殺手段來對付羅先生，但他事先曾得到消息，故遇刺時速臥汽車內地板上，刺客雖連放四槍，仍倖免殞命。羅先生被刺之後，才聽友好的勸告，休假半年。

在益世報主筆任內休假半年期中，仍照常在南開大學教課，這年蔣介石在峨嵋辦「軍官訓練團」，特派專機飛津接他到峨嵋談話，并請向軍官講學，款待他極為殷懃，視為上賓。但他向軍官們的第一次講學題是「軍人不得干涉政治」。結果是被蔣匪軟禁一月後，仍返津重理舊業。除益世南開職務外，又兼北平晨報社長，直至抗戰爆發後南下。

抗戰期中先到武漢，被聘為第一屆參政員，後至昆明西南聯大教「英國憲政史」及「中國政治思想史」。新四軍事件後，在渝與沈鈞儒、章伯鈞等發起組織民主政團大同盟，起草政策政綱，努力的目标，仍為多年呼號的國內團結，合力抗戰建國。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有所謂飛機救犬不救人事件，昆明學生憤慨之餘，舉行了一次反孔示威遊行，事後國民黨反動派疑及他是幕後指使人，除解聘其教授外，並請去重慶談話，詎入川容易出川難，在渝竟又無形被軟禁了一年，後來要求返江西原籍，才獲准出境，並贈川資，但他路經貴陽時偷偷的躍到了昆明，大幹而特幹起民主同盟來。

文人論政，離不開報紙刊物，羅先生二十年來的戰鬥，即以一支筆作為主要的重武器，更往上推，他在學生時代即與筆墨生涯結不解之緣，在國內清華學堂肄業時，作過清華周刊總編輯，五四運動時，全國學聯在上海辦學聯日報，他是編輯之一（許德珩任主編）。留美時期，他是留美學生會出版的留美學報的編輯。返國後，先在滬辦新月，後在津主持益世報筆政。抗戰後，先在昆與聯大友人合辦今日評

論，後辦民盟機關刊物民主周刊。政協後在渝任民主報社長，不時寫社論。抗戰勝利後在京滬雖然因種種困難沒有辦成刊物或日報，但因身居民盟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仍緊握着一管橫掃千軍的筆，與當時的狂瀾逆流作劇烈的搏鬥。

他雖然幾十年來手未離筆，可是有一樁奇怪的事，就是他不會出過書。如果要出文存之類的集子，僅是將益世報的社論選輯起來，即可成巨帙。可惜他似乎無意於此，據說戰前曾請人剪存幾本，以後行蹤靡定，完全散失了。他用筆雖勤，却不苟且，對於敷衍面子的應酬文章，一向拒絕執筆。可是他如感到有話可說時，明知說出會開罪於人，只要切中時弊，仍勇敢地發表出來。記得去年三月間他正每晚為民主報寫社評，突因服錯了藥，一度雙目失明，在醫院治療得已呈好轉現象時，有報社同人去探視，開玩笑地問他道：「假如你的眼睛真的像近幾天某些報紙說的完全瞎了，你以後怎麼辦呢？」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繼續幹！只要我的腦子還存在，眼瞎了沒關係，我可以口說，請人代筆。」是的，他的武器除了一支筆之外，另有一件也很犀利的工具，那就是人所共知的他的一張嘴。（辛斤）

## 職教社的創辦人黃炎培



黃炎培氏是以終身從事教育事業自命的，他的基點，從前是上海林蔭路的江蘇省教育會，後來便是雁蕩路上自建新廈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江蘇省教育會，在當時教育界中是居相當領導地位的，江蘇教育廳長的任命，隱然要先得省教育會的同意，而當時各省立學校校長，幾乎全是省教育會的推薦。歷任會長，都是袁觀瀾（希濤），沈信卿（恩孚），黃炎培最多是一個副會長的地位，而實際的靈魂，繫於黃氏。

省教育會除各省立學校是他的勢力範圍外，還有一個「東南大學」也是受他們影響的，當時東大校長是郭秉文，郭與教授中的楊杏佛（銓）是死對頭，因此楊便遷怒於省教育會，黃炎培氏遷怒負責實際責任的副會長。所以後來北伐告成，楊定首任國民黨市黨部常委，首先即佔領西門林蔭路教育會址成立市黨部，黃氏則趁此「乘桴浮於海」，去游歷了朝鮮，日本，後歸來著有「黃海實遊記」，「之東」等書出版。

黃氏到底是有眼光，有毅力的，當五四運動之後，國內新潮蓬勃，他便提倡「雙手萬能」，主張教育應與實業界連繫，於是便拉攏當時實業人士如穆藕初，簡照南之流，創「中華職業教育社」，並募捐建築社址於當時法租界的華龍路，為百年大計。北伐成功時，雖遭挫折，但職教社這一大本營終得保留，作東山再起的資本，所以另有人替他題一個綽號，叫「不倒翁」。

九一八後「以黨治國」的聲浪漸低，黃氏開始應史量才之邀，入申報館主持總管理處，替申報作了許多的興革，造成史量才執當時上海新聞界牛耳的地位。一二八戰起又佐史氏組「地方維持會」，供應前線



用物品，後來維持會改爲「地方協會」，成爲上海地方有力社團，一直由史任會長，黃任總祕書，及後史被暗殺，會長改由杜月笙繼任，而總祕書始終未易人（黃與杜爲浦東同鄉），直到八一三後國軍西撤，協會無形停頓爲止會。

抗戰烽火之前一二年，他又動游興，會以盧作孚之邀入蜀，歸來成「蜀道」一書，這一時期中，似乎尙會著有「五六境」斷腸記等短集，斷腸記是記割盲腸經過，五六境則是五十六歲所集雜文，及抗戰後再度入川，人地均協，職教社連中華職校，均先後在重慶張家花園從容的開辦起來。黃在渝與江問漁（恆源）冷禦秋（通），同被聘爲第二屆參政員（江冷均職教社理事），並任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祕書長，飛到菲律賓一次；日本投降前，又曾由參政會推舉去延安，寫過「延安歸來」一小冊子，傳一度爲國民黨所忌。

職教社初辦有周刊一種名「生活」，前幾期是由王志莘編的，不久即改由鄒韜奮編，逾年後大見進步，竟被僞政府禁售，旋改名「新生」，又發生「閑話皇帝」案，杜重遠因此入獄，於是新生改名「大眾生活」，被禁後再改「永生」，後來韜奮另營生活書店，便與職教社的母體脫離了。

一二八後黃與職教社份子另發行「救國通訊」，後簡名「國訊」，抗戰後遷渝出版，三十年左右發行香港版，文字與重慶版完全不同，因有許多話重慶不能通過檢查，而香港則否。記得在重慶時，傳說黃等會一度擬組政團名爲「國訊同志會」，草擬了一個計劃，由黃、江、冷等三人具名往見蔣介石，蔣介石一味敷衍，閱後便批：「交社會部依法辦理」。黃等即據以往訪社會部長谷正綱，請准成立。但谷與陳立夫朱家驊磋商之後，決定不能准許，因他們認爲：「組織成立後，上層的幾位老先生當無問題，而下層份子難免不爲共黨操縱」，於此可見當時政府對政治活動的不肯放手。後來黃氏與張瀾羅隆基諸氏，組織民主同盟，現任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民主建國會成立，也被選爲理事。

## 農工民主黨領袖章伯鈞

章爲安徽桐城人，現年五十四歲，德國柏林大學畢業，早期曾從事教育工作，並曾任安徽某師範學校校長，北伐時代爲鄧演達部下之一科長。現在大家都認爲鄧演達爲第三黨領袖，其實鄧在世時，並無第三黨之名，而係爲「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民國十六年的反共運動後，鄧演達，陳友仁，在莫斯科發表宣言，宣佈成立新黨，於民國十八年六月成立，鄧被殺後「行動委員會」發生分裂，徐謙在華北另組「中華農民勞動黨」，不久即解體，章伯鈞即組織「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至於第三黨之名稱，並非法定名稱，乃因成立之時，曾自稱係介於國共之間的第三黨，乃有第三黨之名稱。在七七抗戰以前，第三黨是處於秘密活動的情況下，直至七七抗戰發生，第三黨發表八大主張，宣佈共赴國難，該黨乃以半公開姿態出現。現已改名爲農工民主黨。

與農工民主黨發生關係，或會有湖原的著名人士很多，如徐謙，譚平山，黃琪翔等。現在該黨的重要人物，有章伯鈞，彭澤民，彭澤湘，辛志超，麥朝樞，施達人，王君全等，其中彭澤民，辛志超都是民衆常委，並負有重責。

他的半生，可以說是流亡，二十五年以來，到處「避難」，香港，日本，上海的前日租界，都是他的避難所，窮時身上不名一文，緊迫時，到處有人等著捉他，可是他始終沒有一次表示畏縮或妥協，由一個健康的青年人，變成了現在灰白了頭，佝僂了腰的樣子，這是他不斷在貧病交迫中工作的結果，但他從沒有放棄過他的工作。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民主政團同盟宣佈成立時，章爲有力之推動者之一，改組成民主同盟以後，他又是最積極的一位。國民參政會成立時，他是第一屆的參議員，可是到第二屆，就被剔除，那是因爲章氏對政府批評得太尖銳了。雖經有一雜誌上說某次敵機空襲時，在防空洞中章氏對政府大肆譏評，被人

告上去，誤爲張申府所言，後始知爲章伯鈞，兩人乃同落選，此說自屬不經，但章氏係因對政府不滿而被剔除，則可斷論。

章雖爲農工民主黨領袖，但向不以農工民主黨之名義對外發言，他曾表示爲了使民盟表現團結與步調一致，所以不願用農工民主黨的名義活動，後來民盟二中全会中通過民盟今後以個人盟員爲主體，取消團體盟員，乃決定加強農工民主黨之黨務，由此亦可見章對民盟這個組織愛護了。

有人說過民盟是一個讀書人的集團，都不離書生本色，章氏亦表示過等時局平靜後，多讀一點書，並願再恢復教書生活，教育是他的本行，他還願意從事新聞事業，現在雖然他整日爲黨務忙，爲民主運動忙，可是仍隨時留意買好書，往往一部他心愛的書，心中想買，可是太貴了買不起。他的志願總有實現的一天。

他與南方將領如李濟深，陳銘樞，蔡廷楷等私交甚篤，這是因爲演達的關係。鄧爲廣東人，與南方諸將領的關係很深，農工民主黨在南方也較有基礎。民盟南方的重要負責人，就是農工民主黨的彭澤民。（蜀君）

## 民主促進會領導人馬敘倫

提起馬夷老，就不能不同時提到不屬於任何黨派的一個真正人民團體的「中國民主促進會」，「民促」創立的日子雖然不久，但它却有一段光輝燦爛的歷史，在國民黨統治區，特別是在上海，當抗戰結束以後一直判今天這段時間內，民促會團結了許多文化人和工商界人士，領導了和發動了大城市的為數頗為龐大的羣衆和國民黨反動派作堅強的鬥爭。「民促」的領導人會聲嘶力竭為揭穿反動派的陰謀，為促進真正民主早日實現而到處公開講演，著文宣傳，在以「民促」為主力的上海各人民團體的領導下，抗戰後上海規模最大的一次羣衆性運動發動起來了（即六、二三和平請願運動）。給全國人民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這一個團體的領導人，便是今天還在華北解放區繼續為人民革命奮鬥的老戰士馬敘倫（夷初）。

夷老浙江杭州人，今年六十幾歲了。辛亥革命時與蔡元培、沈鈞儒在浙江省響應，曾被推為浙江省長，堅持不就，會當過北京政府時代的教育副總長，卸職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五四時夷老以同情和支援學生運動，在北平新華門前被軍警毆打受傷。蔣介石掌握政權，他始終堅決反對。抗戰期間，夷老沒有離開上海，爲了避免敵僞注意，拒絕會客，閉門讀書，戰事結束後，看不慣反動派在上海一味蠻幹，著文力加抨擊，他在「民主」，「週報」上先後發表的許多文章，真是淋漓盡致，傳誦一時，後來大概感到單靠寫文章，力量還是很微弱的，於是除了參加各大學和各種團體的集會，講演以後，（當時幾乎每天都）有林漢達，王却塵，周建人和夷老的講演。）還和王却塵先生，許廣平先生組織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六、二三和平請願運動時，馬氏和閻寶航，雷潔瓊諸先生被推為晉京請願代表，車抵下關，即被反動派唆使「蘇北雜民」圍着毆打，因此受了重傷，在家裏躺了好些時候，才告痊愈。反動派對於夷老所加的迫害，絲毫沒有使他受到挫折，相反的却增強了他的鬥志，由上海而香港，由香港而東北，夷老比以前更

堅強的站立起來了。

夷老是今天中國有名的文字學家，對金石也極有研究，寫得一手好字，朋友們去求他的墨寶的，除非實在忙不過來，很少會遭到拒絕的，處世做事，極為嚴謹，空下來不但專心研究他的文字學，而且還瀏覽各種社會科學的書籍，近幾年來，雖則都一連過着緊張的生活，但是夷老仍然沒有放棄過書本。（風）

## 愛國僑領陳嘉庚



在南洋，尋覓中國籍的百萬富翁並不算是什麼難事，但是在這些工商鉅子中間找出一位領導人，那無疑的，却只有愛國老人陳嘉庚了。

華僑愛國，在歐戰爆發之前，成爲一件犯法的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聯合華僑八百萬，復興民族一條心」的宗旨下，若沒有這個老人長住在會內坐鎮籌劃，那麼，恐怕又是一個泡影。然而，這個會，從中國抗戰開始，一直到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的太平洋大戰爆發，當眞作到「縮衣縮食，出錢出力，任勞任怨，不餒不驕」的程度，成爲抗戰的三大支柱之一。

這位受南洋數百多團體所擁護的鉅人——陳嘉庚，出生在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前十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公元一八七四年，也就是滿清同治十三年，也就是孫中山先生誕生的第九年，也就是日本大舉侵犯台灣的一年，他在福建同安縣的集美社出生了。

這個風景明媚的區域，和廈門的江頭社，僅有一水之隔。明朝末年，延平王鄭成功舉義金門廈門的時候，魯王南下，就以此地爲根據地。這裏的人習慣過海長征，陳嘉庚的父親，那時已在新加坡經商有年，因爲不十分得意，所以仍然把眷屬留在故鄉，他的童年是在私塾裏渡過的，父親如松先生到他十七歲時，就帶到南洋去，此後直到三十歲，中間有三次返國。

陳嘉庚到三十一歲時，才自己集資辦了一個謙益糧店，顧名思義，可以想到陳氏的家風與作風。跟着又得風氣之先地創辦了一家波羅密罐頭工廠，次一年買了山地五百英畝種植波蘿，年取益二萬元，使

他有力發展自己的事業，那時，南洋種植橡皮已在開端了，他又設法買到二千元的橡皮樹種子，在波蘿樹旁試種。

當他在主持糧店的時候，同時注意到糧食加工工業，三十三歲的時候，他從盈餘中提了二十萬元，又買了一家熟米製造工廠，所謂熟米工廠，原先是印度人所開，把黃穀先行煮熟，再行晒乾脫粒；這樣一來，米內營養不失，吃了也就不至於鬧腳氣病，工廠每機費五百担以上，分銷南洋及南印度。

民國紀元前三年，是清朝最末一個皇帝溥儀登基的時候，陳氏年三十六歲，他的革命意識一天比一天濃厚，眼着着清室的誤國，憤然剪去了自己的辮子，表示與滿清關係斷絕。就在這一年，他試種的橡皮樹已經陸續長成，就以三十五萬元之代價，轉讓給一個英人，以這錢為資本，再買山地二千英畝，大量栽植橡皮樹。

孫中山先生帶着他的革命主義到了南洋，陳嘉庚和一些有頭腦的人，都加入了同盟會。在三十八歲那一年，他以工商業經營所得，建立了道南學校，親任學校總理，團結一批同志，用來散佈革命種子，這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全國響應，陳氏的故鄉也在十一月九日揚起義旗，他翌日就在新加坡福建會館舉辦保安捐款，他以人望甚高，被推為會長。

中國國民黨這一年在南京建立了中華民國，改元第一年，陳氏帶着一個志願和一批機器，作第四次返鄉。他的志願便是宣佈要創辦一個集美兩等小學，要中國人和南洋人一樣的，不分貧富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他以前攜回的機器，想要發展海產，請了一位日本技師來製造海蠟罐頭，不幸後一個計劃，不為地方所歡迎，便又改製其他食品，以資維持，這就是陳氏返國辦學校，興實業的開端。這以後十二年中集美從幼稚園進而到廈門大學，先後耗資八百餘萬元，對實業則以內戰頻仍，他不能不失望了。

民國二年，陳氏由家鄉重返新嘉坡，專心改進他的波蘿密罐頭工廠。民國三年抗戰爆發，他租了有期限的輪船四隻，常川行駛南洋印度之間獲利甚大。五年又以百萬元，自購七千噸輪船二艘，航行歐

亞·中國參戰了以後，派華工到法國參戰，所坐的就是這兩隻中國經營的海船。這時橡皮的價格在戰爭中也一天高似一天，陳嘉庚先後把波蘿熟米兩廠改爲橡膠製造廠，以他日已有運輸機構不受別人轄制，可以直接運銷美國，獲利更爲可觀，不幸到了民國七年秋天，那兩隻七千噸的大輪船先後被打沉在地中海內，幸賴先期保有兵險，收回了一百五十萬元，陳氏就以這筆款子中四十萬元，到冬天又買了橡皮園一千英畝及山地數千英畝，又在霹靂邦的太平洋埠檳榔嶼創設橡皮分廠，一心一意專理橡膠事業。

民國八年氏四十六歲，這年因他清算了一下自己的債務，結餘淨賺了四百萬元，而歐戰地也結束了，他乃作第五度的返國，八月到了故鄉，對於學校要發揮他的更大懷抱。翌年十月，他特到上海，訪問教育名流，商談建立廈門大學的計劃。他聘有余日章、郭秉文、李登輝、黃炎培、胡敦復、鄧聚英爲籌備員，民國十年四月六日，在集美學校開幕，五月八日在廈門演武場行新校址奠基禮，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廈大改爲國立。

當十一年二月，廈大正式遷入廈門演武場時，陳嘉庚特別注意爲閩南造就水產人才，先資送吳淞水產學校的畢業生赴日深造，後來又以三萬元建集美漁船第一號，給學生來實習。十二年又以七萬元購得法國漁船一隻爲第二號，可以出海捕魚。陳氏在營業有利，不僅想毀家來擴充他所建的學校，還要籌劃捐建廈門福州上海三處的圖書館。那時候，陳氏道：

「閩南富僑在南洋有千家，每人能在故鄉辦小學一所，每年所費不過一萬元，如此何愁教育不能普及。」

陳氏認爲興學校，辦實業是建國的兩大任務，不肯放棄任何一樣。在廈大開學這一年，他又將第一個橡皮製造廠改爲熟橡皮製造品工廠，以走上工業的途徑，並紀念廈大的完成。

民國十一年三月，陳氏第六次回國，當他到了廈門之後，本想返故鄉一行，不意新嘉坡橡皮價格，競爭激烈，便取消了原議。這以後，幾乎二十年，他在艱辛奮鬥，未返家鄉。返新嘉坡以後，他參加了



大競賽，努力擴充熟橡皮製造品工廠，並設分廠九處，曾一度到爪哇去設立分行，推銷成品。這一年，他四十九歲，已到了精力旺盛的最高潮。

陳氏的黃金時代是民國十四年，由於英國政府限制橡皮生產，因而價格大漲，陳氏出賣了第二橡皮樹園，得款一百八十萬元，以此款購山地七千英畝，再種橡樹。這一年中，由橡皮廠獲利四百萬元，除債務外，計有資產一千二百萬元，橡皮樹園一萬五千英畝，每畝每年入息約計一百元，以半數計，亦有七十五萬元。次年春天，又以六十五萬，購入橡皮樹園一千英畝，這個園子距新加坡僅六英里。他的事業中計用工人二萬，倚而為生的十萬人以上，附設有牛皮廠，肥皂廠，製紙廠。十五年夏秋之交，橡皮價格大跌，陳氏首次感到失利，多少原定計劃都無法實現。

從民國十六年起，不幸事件連續地在打擊陳氏，這年他出賣了橡樹園二千英畝，得款三百五十萬元，但仍不足支出。十七年濟南慘案發生，陳氏舉辦籌賑會，被推為會長，因為他的抗日態度，使他的熟橡皮製造品工廠被人縱火焚毀，損失六十七萬。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一片世界不景氣的巨浪波入南洋，日本資本家以國家力量，在新加坡設樹膠公司，與陳嘉庚公司抗爭，陳氏孤軍奮鬥，是年又賣去橡園六千英畝，得銀二百六十萬元，除還債外，所餘無幾。十九年，不景氣的逆流更行超過以前，陳氏的事業更走上下坡路了。

到他六十一歲的那一年，是民國二十三年了，難得他又一拖幾年，在此不得不告破產。這個老人的成功處，是得風氣之先。當他種植橡皮之初，他就認定了二十世紀是個橡皮時代，馬尼亞是個橡皮出產中心，加之距離祖國不遠，如果建立大規模製造廠，不僅可以利益僑民，而且可為祖國未來的橡皮工業奠基，如此，他的熟橡皮製造品工廠一地，就用了資本八百萬元，僱用僑工六千名，發售區域有八十處。當他與日人商戰失敗之後，英國人以陳氏事業過大，影響治安，願意出資贊助，但是都提出了苛刻的條件為交換，陳氏甯破產而不惜毅然拒絕。

英雄氣質的人是不會灰心，他仍然不以破產而灰心。民國廿四年，國內十一省大水災，陳氏雖在風燭之年，仍任華僑籌賑祖國水災會會長。廿五年，蔣介石五十壽誕，陳氏又被推為馬尼亞購機壽蔣會長，得機十五架，命名為馬尼亞隊。西安事變以後，爲了團結與統一，陳氏主持了華僑援蔣救國會。抗戰終於在二十六年爆發了，他發起組織新加坡籌賑祖國難民會，同時又被推為馬區通訊處主任及新區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主席，他自己每月認捐二千圓，先交一年，其中半係告貸所得，由於他的領導得力，一時成爲風氣。

「恨無百萬元，」陳氏說：「若有，我將全部購債，貢獻國家。」

二十七年十月十日起這一南洋華僑籌賑總會統一機構產生了，一致推陳氏領導八百萬僑胞爲抗戰努力。在太平洋事變爆發以前，僑胞捐款在八萬萬元以上，獻金二萬萬元以上，匯款回家在二十萬萬元以上。假定銀行中有一元基金，即可發四元鈔票的話，政府發行三十萬萬的公債除第一次五萬萬元外，其餘皆爲銀行所買。其實，直接爲銀行，間接仍是華僑，因爲銀行準備金大半是靠了僑匯。

二十八年春第一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開會，陳氏提出了「敵軍未退出中國前不得言和案」，三月裏又請通緝汪精衛以正國法，秋天又電英國領袖，請勿賣友，以主公道。並在這年募得寒衣五十萬件及藥品分別運輸回國，前方和後方的國人，無人不知道這個大偉人。

後來他興奮地回到祖國，陳氏以南洋華僑慰問團團長資格，先後到過川甘青陝新寧豫鄂湘浙閩粵黔桂滇十餘省，目睹反動派投降分裂的陰謀，以及虐民暴政，他毫不諱忌地打擊反動頭子。這從他親手撰寫的「南僑回憶錄」和各種文告可以看到。

陳先生是認真極直是非分明的，一言一字，絕不苟且。在集美學校教職員座談會上，他大談延安風物，盛讚毛澤東和中共成就。末後，他很關懷陝北醫藥的匱乏。當時投降份子聶張，陳先生特手書「言和者就是漢奸」數字，交給集美校友有關各報發表，以揭露和粉碎當時反動派的賣國陰謀。

陳先生極愛他的優秀弟子，在南僑回憶錄裏一直提起在陝北和陳伯達（集美學生）以及一些僑生廈大集美學生熱切而愉快的會晤。回到集美學校後，當他看到那種軍事管理與行禮儀式，很是愕然。當時的學校負責人之一，違背了陳先生的辦學宗旨和志願，利用集美學校做政治投機的勾當，爬上了省府祕書長的高座，當陳先生在印尼避難無音訊時，他跟國民黨反動派李雄、黃珍吾等勾結，在報載第三國際宣布解散之後，他們通電要求中共自動解散。勝利以後還裝腔作勢地函請陳先生准予辭職。據說陳先生這樣回覆他：「假如南京有官可爲，請聽尊便，如無官可爲，請晉守教育界清節」。

由此可見陳先生之遭受國民黨的忌恨並不爲無因的。廈門大學學生自辦的嘉庚閱覽室在去年秒被搗毀和封閉。他老人家的著作「南僑回憶錄」是被禁閉的，他辦的南僑日報更不用說了。

三十六年三月七日全國學生抗議美軍駐華暴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廈大代表廈門區同學參加。當讀到陳先生支援的電文時，與會同學都感奮萬千，大會一致通過向陳先生回電致敬。

重慶的舊政協開會時，中共提出邀請陳先生參加，被國民黨拒絕。今日在籌備中的新政協會議，陳先生已由毛澤東先生邀請返國參加了。（菲君）

## 威武不能屈的張東蓀



燕京同學常到燕東園三十四號去，成羣結隊地奔去，在他書齋中坐下來，談國事，也問哲學上的問題，偶而翻開他堆滿着四壁的書，一看到了一位哲學家學問的博大，假若政治已經民主，怎麼能够把一位治學的人從書齋中拉出來呢？大家時常奇怪着：張東蓀先生是一位哲學家，是研究康德，柏格森的人，在他「唯物辯證法總檢討」一書中，他曾經說：「唯物辯證法是牽強附會，與混淆不清的東西。」而在他的「新哲學論叢」中，他強調知覺自身，由知覺去認識物，他這樣寫：

「對於物的本身我們是不能知的，而我所知的只是關於物與物間的相關的條理，并且這個關於物理的知識却又不是純粹的寫實，乃是我們用了自己的內範而作用於外界上互相交織以演成的。」

由於這，他和當時的辯證唯物論的人起了一陣子爭辯，他是極端主張人格自身教育的人，萬事如人心好則好，所謂「無我的人生觀」，他是把社會看作「人生的一部份」的，從這點來看張先生是決不會走出「三十四號書齋」的，但畢竟是走出了。

這是人民的要求，今天的潮流是只求合不求同，只要爲了人民，對各人的人生觀已不會苛求了，可是張先生終是一個進步的人，他後來已不大承認他最早的哲學了，從社會的體驗中，他是勇於揚新棄舊的。

在「理性與民主」中，他寫道：

「關於民主軌道在制度方面是憲法與選舉等不必多論，而在文化方面則是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人生

觀與社會觀，亦就從社會，歷史，哲學，論理學各方面把民主主義建立起來。」

這真是一個堅定而曲折的過程，寫過了數本唯心哲學的書，如「新哲學論叢」「哲學ABC」「科學與哲學」……太多了，推翻過柏格森的創化論，後來又專治力於康德，服膺過二元論，重經驗也重先知，否定過社會本身的辦法發展，如今志在為社會的發展爭取人民的解放的人了。

真是一個高風亮節的讀書人，拘謹的行動中露出洒脱，談話雖疾惡如仇，也很豪放，接待同學特別感興趣，雖然他在九一八的前兩年就進了燕京，一直教着哲學系的課，但却未染上燕京的津津於上課點名的作風，也從來不用死的東西來貫輸了一個鐘頭的教室，在他的處理下使學生得益匪淺，使學生異常有味。

開了三班課，「民主哲學」，「康德」，「中國哲學史」。大家對「民主哲學」特別感興趣，選的人特多。他剩下的時間，除了坐在書齋中而外，是和同學談天。要不，就是為民社黨的事而煞費心機。

由於此，燕大的校務長司徒雷丁，對張先生很感「頭痛」，司徒常說：「張東蓀什麼都好，教書教得好，同事間處得好，和學校也處得好，只是反對政府這一點有點……」相反地，張先生說司徒雷丁是一個好人，但却是一個美國人，在美國的政策下，他很……

記得在燕大前年復校時，司徒雷丁曾留信給張東蓀先生要他不從事政治活動，結果司徒很感「頭痛」而已，和梁漱溟一樣，他很瘦，却瘦中帶勁，用中國老話說是頗有氣節。對人如此，對事又何嘗有兩樣，當他被日本逮捕時，那時剛剛太平洋事變不久，他至死不屈，在監牢中會欲自殺，未為日本人所誘。「威武不能屈」，是他的氣節，讀萬卷書，就是為爭取這麼一點。六個月的艱難困苦的生活，終於仍然是張東蓀而出來。——這是一個考驗，第二次考驗就是不參加偽國大，二個嚴重的考驗之下，張東蓀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人。

出牢後，在家裏被日本人軟禁；暗地裏他却和八路軍有了聯絡，做着地下的抗日工作，他並不怕別

人認他爲共黨而就不抗日，不爭取民主。  
讀書人離不開書，事變期間寫了三本書，只「理性與民主」尙未出版，最近打算寫一本他在獄中時的  
生活的書。（君放）

## 人民政治學家鄧初民

鄧初民先生，這位六十一歲爲人民大眾服務的學者，偉大的青年導師，社會科學家，民主戰士。他是民盟中常委。

鄧先生是湖北藕池人，家境很清苦，因此家中除了鄧先生和他的父親唸書不操作外，可以說家中沒有一個人不勞動的，就是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也是孜孜不倦地整天地操作着。鄧先生自幼就愛好社會科學，當他在啓蒙讀經書的時候，最喜歡讀孟子。中學時代學的是文科，民國元年到他到六年他在日本法政大學攻政治學，回國後在湖北石首縣當小學教員，也做過鄉自治公所鄉董，民團團總，但是他對待老百姓是異常愛護的，這也許是他那位以善良聞名的父親所給予他的影響。他在湖北省當過法科大學教務長。民國十五至十七年任國民黨務幹部學校校長，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上海暨南大學教授，廣西大學教授，抗戰後任成都朝陽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因爲主張民主不容於當局，就給特務份子「趕跑了」，他很感慨地說：「自從三十年到重慶後，受到的政治壓迫，真好像項頸間掛上了一條鏈子，隨着政治的情勢在收放着。」

鄧先生從武漢大革命失敗後，一直教書至今，沒有去過南京，他專門讀書，研究的重心是社會科學，同時他建立了一個生活原則；凡在公私利害衝突的時候，他的決擇是捨棄私利。並向青年們說：「自己不肯做工，切勿壓迫別人也不做工，自己不肯吃苦，切勿壓迫別人也不吃苦」。來勉勵青年爭取工作，刻苦生活。

他完全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祇要對大眾有利的就贊成，有害的就反對。他認爲革命不是人家叫去革的，也不是爲別人革的。黨不是目的，爲人民服務才是目的。但是他也不反對有黨派，所以他本人在今天確實還是一個國民黨黨員，同時也是民盟的盟員。他生平很坦白，並且非常謙虛，總以爲自己無用

。在一二八紀念會上我們不是聽到他的震撼世界的獅子吼嗎？他曾毫無顧忌嚴正地指出：「一二八是中國人民自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政權的紀念日，當年主張對日寇不抵抗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但是，今天不敢反抗美軍暴行的，不一樣是奴才，是美帝國主義的奴才嗎？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汪精衛已被打倒了，今天美帝國主義的奴才，也一定要被打倒」。可是他認為他的叫喚是一種掙扎，實在心裏不得過的時候才叫出一聲半句，他說這並不是勇敢。並且歷年來，他為民主呼號奔走都是被環境迫出來的。所以他是一個要說就說，要做就做，沒在黨派觀念，沒有絲毫為自己打算的動機，但是他在拿得出一分力量的時候，也決不勉強留他半分，拿得出半分的時候也不硬要拿一分。

自從他教書那天起，他是一直保持着不壓迫學生服從自己的意見，他認為他的話並不是天經地義，他也是在學習並且他常教他們不要祇聽一個人的意見，不要祇看一本書，應當多聽各色各樣的意見，多看各種各樣的書籍，所以他對懷着高度求知慾的青年說：「即使你現在的思想是對的，信仰是對的，但是你亦應多學習多看書多交朋友再來決定自己的思想，決定自己的立場，這樣才能站得住，才能堅決，否則就是盲從」。他主張在沒有機會入學校，不得許可入學校的時候，難道就不學了嗎？他認為有學校有錢，也得自己學習，沒有學校沒有錢也可以自己學習，這才能滿足我們的求知慾，社會是一本大書，除書本外必須自力更生，隨時隨地把精神集中向社會學習？

當他談到學習的時候，他就緊接地的出「學習些什麼」？「為什麼學習」。

他就簡明地說，既然人不可否認的是生物，生物基本的要求就是「活下去」。那末要求人類共存下去，學社會科學的就得學習怎樣改造社會，怎樣提高人類社會的幸福生活。

鄧先生在學習上的成就，即使在學校求學也是自學的成份多，他對社會科學的貢獻，戰後出版的有「社會史簡明教程」（生活版）「中國社會史教程」（文化供應社出版）新政治學大綱（生活版）民主的理論與實踐（文治出版社）世界民主政治新趨勢（華夏版）。（嚴敏）



## 在南洋苦鬥的胡愈之

記得勝利以後不久，曾傳出了胡愈之先生客死在南洋的消息，當時有不少人寫了紀念或追悼的文章，發表在各種刊物上。後來證明這消息不確，大家才又轉憂為喜，深慶這位文化戰士的健在。從這一憂一喜上可以看出大家對於胡先生的敬仰與關懷。現在我想這幾年來胡先生在南洋的情形報告一下，或許是讀者諸君所樂聞的吧。

胡先生在南洋快六年了。如果我沒有記錯，他是在一九四〇年冬應南洋商報之聘從香港到新加坡的。關於他在南洋商報任總編輯這一時期的情形，好像已經有人報導過，我想不必在這裏贅述。不過有人說他是陳嘉庚先生請去的，則似出於誤會。當初南洋商報雖然是由陳嘉庚先生獨資創辦，後來却改成了股份有限公司，陳老先生的股份也都讓給了別人，所以實際上，南洋商報可以說和陳老先生沒有任何關係了。而陳老先生是南洋福建幫僑胞的領袖，南洋商報則是福建幫辦的報紙，所以一般人總認為南洋商報是陳嘉庚先生的。誤會的原因或者是如此。

陳老先生向來是南洋僑胞團結抗日的旗幟，南洋商報也曾是鼓吹僑胞團結抗日的言論機關，那時候，二者的關係倒確是相當密切的。胡愈之先生進南洋商報以後，竭力在言論上新聞上加強該報對僑胞作團結抗日的宣傳，跟陳嘉庚先生所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這是南洋華僑統一的抗日團體，因為殖民地政府不許華僑有政治性的組織，所以用的是這個慈善團體的名義。）作了很好的配合。當時南洋僑胞之所以有這樣如火如荼的抗日愛國運動，固然主要的該歸功於南僑總會的領導與組織，但胡先生主持下的南洋商報顯然是起了號召與鼓勵的作用，也不容否認的。

但是，正因為南洋商報在內部組織上與陳嘉庚先生並無關係，勝利以後該報竟採取了跟愛國老人（南洋僑胞對於陳先生的尊稱）完全相反的態度而成為一張非正式的國民黨報。好像現在還有人說南洋商

報是陳嘉庚的報紙，也有人以爲胡愈之先生仍在主編南洋商報，那不僅是很小的誤會，而且是很大的歪曲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陳嘉庚先生應新加坡英國總督之請，出而組織華僑抗敵後援會，協助英政府抵抗進犯馬來亞的日寇。該會的宣傳股主任就是胡愈之先生。此外，胡先生並且與郁達夫王任叔邵宗漢諸先生組織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成立青年幹部訓練班，積極展開抗敵的文化宣傳工作。這個時期的華僑抗日運動，到新加坡淪陷爲止，只有一個多月，時間可謂極短，但其轟轟烈烈的程度却是空前的。新加坡快要失守時，胡先生爲了免遭敵人的毒手，不得不偕郁先生等搭了一只摩托小船往蘇門答臘島避難，從此過了三年半的流亡生活。

起初他們避居在蘇門答臘東海岸的附近小島上。那些地方，僑胞雖然不少，窮鄉僻鎮也都有中國人在經商或做苦力，但風氣閉塞，言語不通，（那一帶的華僑大部份是閩南人，操閩南方言。）很不適宜於久居。然戰爭決非短期內所能了結，流亡生活也非作長期打算不可。這使他們非得找一個比較可以安居的去處。終於他們選定了蘇門答臘西部的一個名叫巴雅光務的小城市。他們的選擇的確不錯，這地方不僅物產豐富，風景秀麗，氣候涼爽，而且是印度尼西亞民族文物匯萃之區。要研究印度尼西亞的語言，歷史和文化，這地方確是個最理想的所在。

胡先生一流亡到蘇門答臘，就認爲印度尼西亞語有學習的必要，他不但自己努力研究，而且還勸一同流亡出去的文化界朋友學習。當他住在小島上的偏僻鄉村中時，對印度尼西亞語已有了初步的知識。所以一到了巴雅光務這個印尼文化很高的地區，他宛似探到了印尼文化的寶藏而加意研究了。他在一般文化難民中年齡最長，但學習印尼文却進步最快。這不僅因爲他的後腦特別大，聰明過人，而也由於他外國語的根底好，學識淵博，因而理解力來得強。

他讀了很多印尼文的書籍，因而對於印尼民族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那時他就認爲這有着七千萬人

口的印尼民族是東亞的中華印度兩大民族以外的第三個偉大的被壓迫民族。印尼的民族獨立運動將成爲亞洲民族解放運動一個重要支流。他更認爲，一旦聯軍在東南亞細亞進行反攻，爭取獨立解放的印尼民族將起著莫大的作用。他焦急地期待着這一個光明日子的到來，俾得投身於這一偉大的鬥爭中。他甚至用印尼文寫好了一本「告印尼民族」的小冊子，一等時機到來，即可印發，號召印尼民族跟印尼的華僑聯合起來爲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而共同奮鬥。後來日本無條件投降，這小冊子當然沒有印發。但胡先生研究印尼民族問題所搜集的材料很豐富，他有一部關於印尼民族問題的著作，也在流亡時期所寫，可惜尙未完稿而現在還擱置在那裏。

有一個時期，胡先生還想研究阿拉伯文，因爲他認爲擁有三萬萬多人口的各個回教民族，實在是世界的一個大力量，戰後的國際問題一部份也可以說是一個爭取回教民族的問題。他曾經對蚯蚓式的阿拉伯字母有了初步的學習，但終以生活有了變動而不得不中輟。

雖然在流亡期中，胡先生對於時事的研究分析仍繼續不懈。因爲他可以毫不費力地看南洋文報紙，又有消息比較詳細的日文報可看，他對於時事的發展還是瞭如指掌。在德軍攻打史太林格勒不下而聯軍又在北非登陸的時候，胡先生曾寫過一篇詳盡的時事分析的論文，抄給各文化難民傳觀。

在流亡時，胡先生化名爲張福高，後又改姓爲金，大家都叫他金先生或尊稱爲金老，（胡先生在逃難時開始留了鬍鬚，至今未剃。）沈茲九先生也就成了金太太。金先生和金太太化了幾十塊錢在巴雅光務的近郊買了一所簡陋的茅屋，度着他們恬靜的逃難生活。金先生深居簡出，金太太除了上街買菜，也很少外出。他們自稱是賣山東綢的商人。起初倒也沒有什麼人注意他們。後來有位校長是立達學會會員，曾經在學會的某次聚餐會上見過胡先生，而先生的身材相貌又是那麼與衆不同，因此消息一傳出去，這位校長就斷定他是中國文化界的老戰士胡愈之而不是什麼賣山東綢的金先生。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差不多整個蘇門答臘西部的華僑都知道在巴雅光務住着一位學者。他們小茅屋的破爛客廳裏就座無

## 勞工領袖朱學範

朱學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唯一的勞工領袖，是最近十多年來代表中國工人出席各種國際性勞工會議的勞方代表。由於國民黨區的工會運動是受着CC派的一手操縱，因此他在工作上曾經同這批人發生密切的接觸，但是他能夠脫出他們的控制和影響，而毅然決然的走上堅決革命的道路。他的開明的政治見解，他的自由工會運動的一貫主張，和他的不為威脅利誘的堅定態度，是促使他向前發展的主觀上的因素。

他是浙江平湖人，四十二歲，大革命前他工作於上海郵政局小包間，那時郵局裏有郵務協進會的組織，（郵務工會的前身，會員都是郵務生。）他被推舉為小包間的代表。上海郵務工會成立後，他當選為委員。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上海的工運，遭受嚴重的摧殘，進步工會組織，都轉入地下，他被任命為上海工會整理委員會委員，這時他已實際掌握上海工運的領導權。因為他在左右派間採取調和的態度，他沒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所以進步方面對他尚無惡感。工整會改組為上海總工會後，他一直蟬聯主席。全國郵務總工會成立後，亦由他連任主席。

一九三五年四月，由反動派偽民黨的授意，他同陶百川、陸京士等人組織了中國勞動協會於上海。國民黨當時准許成立該會的用意，只是裝璜門面，應付國際而已。因為依照當時「工會法」的規定，是不准組織全國性的職工團體的。該會第一二任理事長由陶陸擔任。抗戰軍興，勞協由滬遷漢再搬到重慶之後，該會的領導權，就入於朱氏之手，勞協的性質就日漸發生變化，而脫離過去的軌道。

在抗戰初期的武漢時代，他發起組織全國工人抗敵協會，並邀請解放區職工代表劉寧一、廖似光等人參加，後來因政治情勢逆轉，而宣告流產。但經過朱氏與解放區工會的這一次接觸後，使中國工人的團結運動展開了新的一頁。陝甘寧邊區總工會籌備會代表六萬工人在一九三九年參加勞協為團體會員，

廖似光當選爲勞協的理事。

一九四三年六月，勞協接受美國產職和美國勞聯的捐款，在後方各地舉辦工人福利事業。四五年，世界工聯成立，朱當選爲副主席。抗戰結束後，毛澤東到重慶，政治自由的空氣一時甚爲濃厚，勞協與解放區工會的合作，這時有了新的發展。四五年九月世界工聯大會，朱與中共職工領袖鄧發聯袂出席。這時鄧向朱提出中國工運的八項原則，經朱同意後，解放區的九十二萬工人就集體加入了勞協。

勞協招致國民黨反動派的忌恨和打擊的主要原因，有下面三點：一是勞協堅持與解放區工會合作的態度；二是勞協接受美工會捐款，引起許多人的眼紅；三是勞協在勝利初期參加工潮調解工作，在重慶工人中間建立了極高的信心，以及它在重慶週圍各兵工廠中的組織活動。反動派對付勞協的手段，最初是指派特務人員加入工作，排斥該會的進步領袖，企圖從內部加以操縱。這樣的做法失敗後，就轉而採取公開的打擊和迫害。一九四六年時較場口血案中，勞協和朱氏被反動派列爲控訴的對象。到那年的八月六日，勞協的重慶機構被武裝接收，員工卅八人被捕，西安、寶雞、開封、漢口等地的工作被勒令停止。反動派對朱的打擊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他們逼迫他接受下面幾個條件：（一）發表反共宣言，摒除解放區工會於勞協之外；（二）各地福利機構由當地社會局、三青團、市總工會參加合辦；（三）改組勞協，清除進步份子；（四）要他出席偽國大。這些條件，他斷然的拒絕了。十一月中，他祕密出走香港，在港建立勞協的臨時總部。在他出走的前夕，他發表了一篇聲明，斥責反動派逼使他反共的陰謀，對於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偽國大，表示他的反對態度。這篇簡短的聲明，當時引起強烈的反響。重慶民主報用「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名句表作這段新聞的眉題。而反動派對他此舉的驚愕和憤怒，自不待言。去年二月，他進入解放區。在去年八月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他當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副主席，兼國民黨區工作委員會主任。（明遠）

## 婦女解放的先鋒劉清揚

一九四八年，張申府在北平世界日報公開擁護僞北平參議會副議長唐嗣光競選僞立法委員，又在觀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呼籲和平」的文字，全國民主人士羣起反對，認為張氏原係民主同盟一位重要份子，不應該發表如此荒謬言論，顯然張氏的思想意識有了極大的改變，不惜爲了一己的享受，恬顏做了反動統治者的幫兇。除了民盟總部決議開除他的盟籍，同時和他有了幾十年夫妻關係的劉清揚，也公開聲言，和他永遠斷絕夫妻關係。

劉清揚，這位年紀已有五十多歲的老大姊，她充滿着精力，雖然她生着一雙半解放的腳，但是和年輕人一樣走路，從不落後，她有着北方人特有的爽朗性格，以及富於反抗的倔強的脾氣，她的一生奮鬥的革命歷史，就可以證明。

她是河北天津人，五四以前在學校裏就很活躍。後來在北平女子師範學院讀書時候，爲了反對袁世凱賣國求榮，舉行遊行示威，她不但參加而且非常勇敢的和反動派的軍隊抵抗，救護了許多受傷的人。五四以後，她就隨着一批中國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國和張申府結合，生了一個孩子，爲自己要求學和工作，不得不將孩子放在一個鄉下人的家裏撫養着，待回國時，聽說還是周恩來幫助他們將孩子抱回來。

回國後，她正式投入婦女解放運動，曾在廣東參加何香凝主辦的婦女訓練班工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她不再像先前那麼鋒芒畢露的工作了，但是她對於背叛革命的反動派，始終採取不妥協的態度。

抗戰初期，宋美齡在漢組織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羅致了全國各黨派的婦女參加，劉清揚擔任了該會訓練組組長，在漢口訓練了幾班各地來的婦女青年，她會聘請了幾位思想前進的能爲婦

女界導師的人，在班裏散播了不少種子，培植了很多婦女幹部。

漢口撤退，退到重慶，「皖南事變」前後，政治的低氣壓籠罩着整個的霧城，蔣宋美齡似乎對劉清揚冷淡了，一九四〇年她便悄悄地到了香港。在香港，她開辦一所「立華女子中學」，完全用國語和新教育的方法教授學生，學校的經濟時常在窘迫中，她，一個人東奔西跑，設法把學校撐持下去。她不拿學校一文薪水，每天啃着枕頭麵包，但是她還是怡然自得，一點沒有氣餒的樣子。

她有二個女兒，大女兒聽說那時已經結婚，而小女兒那時也不在身邊，她將小女兒的照片放在學校裏的辦公桌上，空閒的時候，她常常撫摩着相片，大概也可以解除她一些精神上的寂寞吧。有人勸她和張申府和好，（抗戰前後，張申府另外愛了人，劉清揚一氣就離開了。）她說：「這怎麼行？我不能和一個不忠實的丈夫在一起。」

香港淪陷後，她拐着一雙小腳，背上負着三四十斤的包袱，和許多文化人、年輕人一樣地爬高山，走夜路，通過敵人的封鎖綫，沿途吃紅薯，吃南瓜，睡在不蔽風雨的山寮裏，一點也不叫苦，終於健康地到達桂林。第二次回到重慶的時候，她正式參加民主同盟工作，經常出現在各婦女團體。同時由於沈衡老的再三勸慰，又和張申府恢復了感情，勝利後和張申府一同回到北平。

她很高興和青年人在一起，她常常說：「和年輕人在一起的時候，我自己也好像年輕了。」在漢口時，有許多年輕人從前方下來，貧病交迫，她耐心而誠懇地替這些人解決職業和生活，不敷衍，不漠視。她關心青年，愛護青年，同時她也要求青年對工作态度要嚴肅，正因為她有着爽朗的性格，常常對一些不負責任的朋友，會毫無保留時提出批評，或者為了一些小事，會跟人家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她的一個極得力的幹部，和她有所爭執，她竟會嚎啕大哭，事後，她覺得自己有不對的地方，便坦率地向對方道歉。由於她的天真和靄，十多年來一直是被一般婦女工作者敬愛着的大姊姊。

她曾經說過：「結婚的女人，應該有獨立的生活能力，更應該有獨立的意志，決不能夫云亦云，放

棄了自己的主張；也不能因為丈夫有了地位，自己就養尊處優，丈夫做了漢奸，自己甘心做着漢奸的尾巴！」

當張申府在北平變節以後，很多朋友在為劉清揚擔憂，甚至有人認為她也和張申府一同走上反動的道路，可是，事實勝過一切雄辯，她終於擺脫了世俗的牽累，毅然走上她一貫走着的正確的道路。

現在，她已在自由的地區，重新担負起全國婦女謀解放的實際工作，熱烈地參加了全國婦聯的籌備會，我們相信：從此以後，她會跟隨人民解放事業一樣的茁壯堅實，對婦女解放工作，一定會有光輝的建樹。（梅）



## 繼承魯迅遺志的許廣平

作爲魯迅先生夫人的許廣平，恐怕沒有人會對之感到生疏的，特別是在上海工作的進步文化人，許先生更是和他們共患難，共前進的一位最親密的畏友，敵僞時期，在日寇的嚴刑盤問下，許先生不但沒有出賣過自己的朋友，而且還因爲她的犧牲而保全了朋友；在特務的包圍下，許先生也從來沒有屈服過，相反的還透過了種種黑暗勢力的迫害，和她的同志們在最艱難的日子裏共策前進，許先生是不折不扣的一個魯迅精神的繼承者，她的行動成了許多文化界朋友們行動的歸趨，她的號召鼓勵了許多朋友的前進！

抗日戰爭結束後，她曾經以婦女界大姐的身份參加了勝利後上海第一個三八節遊行行列，那次參加遊行的婦女共有兩萬人之多，許先生跑在隊伍的最前面，她的辮帶花白的頭髮在太陽光底下閃閃發亮，許多人都爲之感動了。

去年冬天，爲了響應中共召開新政協的號召，許先生也受到邀請，帶了她的公子海嬰離開上海，經由廣州到香港而轉赴東北，在她踏上了已經奠定人民勝利的土地上時，她的心情該變得更爲愉快和爽朗吧！（蕭煥）